

第二章

“五四”文学革命及新文学初期的创作



概要

第一节 晚清文学思潮与文学革命的酝酿

第二节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

第三节 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实践



第一节 晚清文学思潮与文学革命的酝酿



一、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

清嘉庆以后，清朝政府日渐衰微，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被迫向西方打开国土，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国力同西方存在相当的差距，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诸多思想家、学者纷纷以谋求社会发展、救亡图存为使命，在社会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思想等各个层面谋求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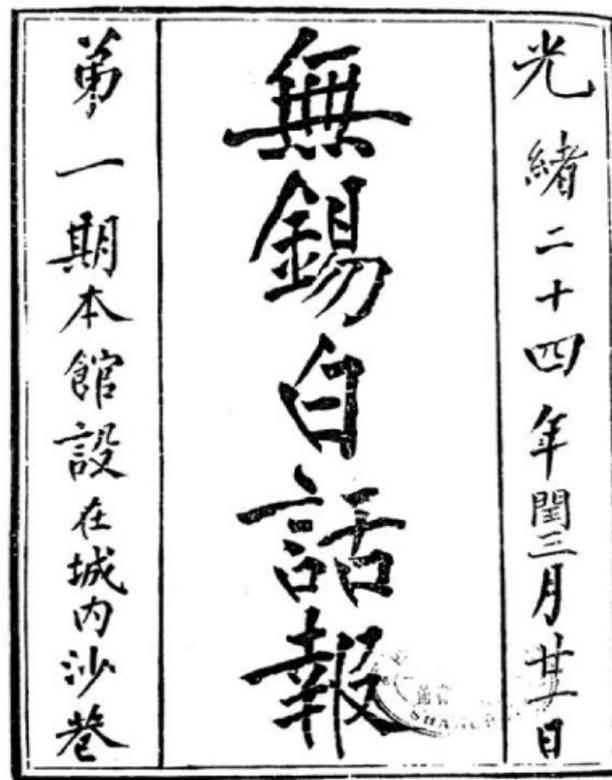
在意识到唯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根本改变，才可以真正实现救亡图存的基础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将改革的重心放在国民身上，从文化、文学的角度改变中国的社会发展。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尝试，他们把文学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将文学作为改革的途径之一，尤其是晚清时期出现的从“诗界革命”“新文体”到“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文学变革，都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他们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出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19世纪末叶，文化改良主义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直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生。

在文学上，随着晚清维新思潮的发展，中国文学又一次出现繁荣的局面。这次文学繁荣是在中外文学的共同影响下出现的。当时，桐城派大力提倡“文学要有用于世”的经世致用思想，关注文学对现实的影响作用，主张为文要有用于社会。宋诗派及“同光体”等旧诗文流派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在语言工具的改革上，晚清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奠定基础。裘廷梁（1857—1943）是倡导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裘廷梁在1898年创办《无锡白话报》，这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刊之一，极力提倡白话文，希望能够使阅读此报刊的人皆“略能通知中外古今，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广开民智之助”。除裘廷梁外，白话文运动的另一先驱陈荣衮，在《知新报》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提出报章文字应改用白话，这是白话文运动中另一篇重要文献。裘廷梁和陈荣衮的文章及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上做出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产生。



在文学创作的改革方面，梁启超等人从理论上和创作上，针对诗歌、散文、小说三大文体，掀起了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对晚清时期的文学发展有深刻影响。1899年，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口号，提倡“新文体”，他本人的散文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以往的文章进行突破。在诗歌发展方面，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认为诗歌需要有“新意境”“新语句”，但同时也需要用古人的风格贯穿在诗歌中。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事实上，无论是严复、夏曾佑还是梁启超，都是希望借小说之力改良政治，看重小说的社会功能。



在文学批评方面，晚清文学家也有所建树。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文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1908—1909年，王国维创作了《人间词话》，这部作品是王国维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具有世界高度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在文体方面，话剧的萌芽也是晚清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晚清戏剧家对中国传统戏剧做了一些改革，但这一点对“五四”文学革命没有太大的影响；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西方话剧的输入。西方话剧的引进为文学革命后话剧的发展直接奠定了基础。1906年和1910年春柳社与进化团分别成立，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的《茶花女》第三幕和排演的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最初萌芽。

晚清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与现代性文学格局的形成。这里最重要的是晚清文学提高了小说和戏剧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体开始有了平等的地位，使文学的格局更趋合理化，从而奠定了“五四”新文学整体格局的基础。晚清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以至文学形式方面，都为“五四”新文学的萌生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晚清时期文学繁荣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外国文学对它的影响上，并在这种影响下表现出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为“五四”新文学融合中西方文化做铺垫。晚清文学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首先体现为翻译文学的繁荣。1896年至1916年的20年间，中国翻译外国小说800种左右，特别是林纾等人的翻译文学提高了外国小说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录的1 004种小说中，翻译小说占据590种。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修正了阿英的统计，在1873—1912年间近代翻译小说的总量是1 101种，而创作小说的总量为1 531种，特别指出1907年以前，翻译的作品超过创作，1908年以后，创作才逐渐超越翻译。

晚清时期，林纾对翻译文学的贡献尤其突出。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林纾精通古文与诗词，一生译著近200本小说，其中包括法国、英国、俄国、日本、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瑞士等十几个国家，包含莎士比亚、狄更斯、易卜生、托尔斯泰、雨果、塞万提斯、笛福等多位作家的作品。他的翻译作品数量多、影响大，但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他翻译的方式是请懂外文的读者将相应的故事讲述给他听，“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再以古文笔法将故事重写出来，译成的作品被称为“林译小说”。林纾翻译的小说对后来“五四”时期的诸多作家都产生了影响，比如郭沫若、茅盾、鲁迅、周作人等人都读过林纾翻译的小说。虽然林纾后来站在了新文化阵营的对立面，是反对新文学发展的守旧者，但是他在晚清时期对翻译文学发展起到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林 纾

—在历史洪流中追寻“译界泰斗”



知识链接: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归有光文相近。他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了。其实林纾的成就还在他的“林译小说”，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严复在晚清时期中西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中也显示出重要作用。如果说林纾在文学创作上引入了西方空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严复则是在社会思想上带来了西方思潮。严复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这部作品1898年在中国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胥黎在其中提出的社会进化论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影响了处于社会动荡中的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了改革社会的势在必行，由此投入了改革运动中。严复引进西方观念的同时还对这些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深化。除了《天演论》之外，他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后人称它们为“严译八大名著”。这些西方理论著作作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社会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等一系列思想财富。



鸦片战争前，报刊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和南洋等地；鸦片战争后，逐渐发展到华东及内地。鸦片战争前影响较大的报刊主要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特选撮要每月记传》（1823）、《天下新闻》（182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等。鸦片战争后，主要有《遐迩贯珍》（1853）、《中外新报》（1854）、《六合丛谈》（1857）、《香港新闻》（1861）、《中外杂志》（1862）、《中外新闻七日报》（1865）、《小孩月报》（1875）、《益文录》（1878）、《图画新报》（1880）、《益文月报》（1887）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创办近代报纸。晚清报纸原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由于报纸发行量有限，影响不大，而且外报占绝大多数，清政府对办报活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不干预。

从1815年具有近代性质的中文报刊产生，到1915年中国人自己创办大型综合性杂志《新青年》，整整10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都与报刊的发展紧密相连。19世纪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文体”“新小说”“新诗”等，无一不与晚清以来的报刊有关。报刊的迅速发展与传播，不仅促使文人思想意识开始由传统转向近代，而且对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与观念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为中国文学转型创造了外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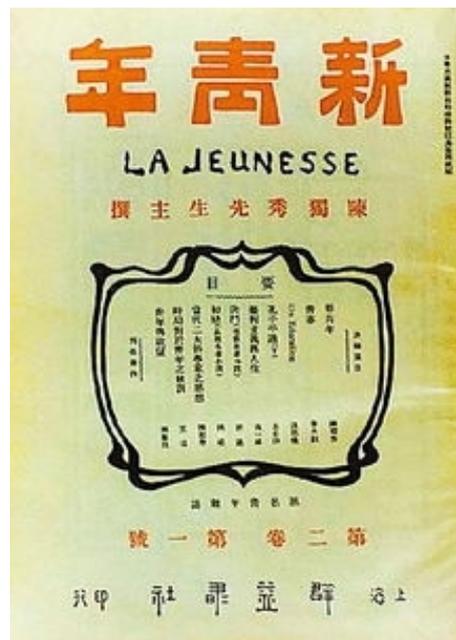
第二节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

一、《新青年》与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

《新青年》是因思想启蒙运动需要而诞生的综合性文化刊物，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进攻批判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办；1916年9月1日，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既是“五四”新文学理论讨论的重要场域，又是文学创作的重镇。可以说，文学革命的产生、发展，“五四”新文学的蓬勃面貌都与《新青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适、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李大钊等都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与撰稿。



文学革命首先是从语言文字这一文学的工具和载体开始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后来，胡适又于《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这“八事”修正为“八不主义”。《文学改良刍议》是最早正式探讨文学革新方案的文章，它的发表，是“五四”文学革命正式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参加文学革命的干将们，致力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同时在内容上反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的文学观念，要求文学应是合乎人性的，表达个人的感情，代表个人的意志。

文学革命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文，以崭新的形式，对封建主义批判的深度和明显的现代意识，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郭沫若、胡适、刘半农的新诗，体现了“五四”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精神，冲破了旧诗格律束缚。叶绍钧、杨振声等的白话小说也为新文学奠定基础。1920年，白话文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1917年至1920年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民族危机的加重，使有志之士倾向于采取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苦难的现实主义。他们的基本倾向是主张为人生的写实文学。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其清醒的战斗精神，以及以现实主义为主，融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因素的创作方法，为新文学开拓了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

浪漫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另一股强大的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郭沫若。他认为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女神》中破旧创新的精神，对理想的热烈追求、歌唱，对大自然的歌颂，天马行空式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极度的夸张，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充分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鲜明特色，在当时的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文白之争及新旧文学的较量

和“文学革命”新思潮相对立的，是复古主义思潮。新文学与复古派的斗争，由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拉开序幕，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最早起来反对文学革命的复古派是林纾（1852—1924）。林纾是晚清最著名的翻译家，先后译有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大仲马的《玉楼花劫》，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等数十部世界名著，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影响很大，对新文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他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反对白话，维护文言，大肆攻击《新青年》，因此受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反击。



林纾之后，向新文化新文学进行抨击的复古派主要有两个：一是20年代初期出现的“学衡派”，二是20年代中期出现的“甲寅派”。

《学衡》杂志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主要编撰者有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与林纾相比略有不同，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写道：“杜威、罗素为有势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之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吴宓也把对西方进步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邪说”。此外，《学衡》杂志又重复胡先骕在“五四”前夕写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的许多论点，反对以白话代文言，反对语文合一，主张文学上的模仿。胡先骕在《学衡》第1卷第1期中作文反对白话诗，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58117103067006103>